

胡百精《说服与认同》——如何缓解现代性认同危机

虽然本书的标题是说服与认同，但我认为本书的主题更像是“对话”，而说服和认同实际上正是古典修辞学派和新修辞学派所认为的对话的两种结果。

本书的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中，作者极力打通、整合古今中外的一些对话智慧，讨论、清理了立言、修辞、叙事、宣传和话语权等有关对话的思想遗产。而在本书的下篇中，作者通过对现代性、共同体和对话主义的分析，阐述了对话是缓解现代性认同危机的手段：通过对话以形塑信息认同、利益认同和价值认同。总结起来，我将整本书分为以下三个部分来讲。

一、说服的使命与前提——立德（一到五章）

作者认为，无论是先秦行人还是现代职业说服者（公关从业者），他们的共同使命就是：立言——分享信息、沟通有无，以形成信息共同体；立功——成就事业、自利利他、互蒙其惠，以建立利益共同体；立德——价值认同、德行凝摄、普洽各方，以形塑价值共同体。他强调，立言是成就功德的手段，同时，道德也是立言的基本前提和面向。“道德的资粮越是丰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事实上，本书中的大部分观点无一把落脚点放在了“德”上面。在本书的上半部分，作者所讨论的立言、修辞、叙事、宣传和话语权等对话智慧，都需要以德为底线。比如宣传既可以是邪恶的头脑操控和欺哄，也可以是整合大众社会的工具，因此，关键便在于说服者的道德。而本书结尾所谈及的对话伦理实际上也就是指对话者、对话关系和对话活动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即道德基准，譬如哈贝马斯提出对话者应确保真实、真诚、正当和可理解等交往原则。

这也给我们公关从业者许多启示：公关从业者应以立德为根本，以立功为目标，以立言为路径。无论是公关还是宣传或是说服，它们都极易“沦为对人性的支配和滥用，但是关系的建立和维系离不开信息沟通和利益互惠，而最牢靠的关系乃是价值上的共识和同构，这本质上就是立德问题。”¹因此，公关从业者应该将道德置于信仰和行规之间，自觉地树立起公众至上的意识，每一次公关都须经得起道德检验，并提升道德理想的温度和亮度，以此获得公众的支持与信赖。此外，公关道德更应具有内源性特征，求“美”求“和”并不应该是因为害怕遭到外部的惩戒，而是甘愿奉行，致力于达到与公众之间的情感共振、精神融通。

¹ 胡百精著 《说服与认同》

二、现代性认同危机（六到七章）

在传统社会中，血缘、地缘、习俗、宗教为不同社群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建构了稳定的关系、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轻松地找到自身的意义感、身份感、归属感，因而，认同问题并不严重。

相反，现代性社会具有庞大、复杂、自反、矛盾等特点，根据本书，作者认为现代性语境下认同危机有以下原因：

1. 现代性将人的理性和主体性视为核心价值，它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主导，持续推进政治开明进步，以实现富国强民和社会发展。这导致了一个意外的后果：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价值理性却逐渐掉落，人们在进步中失去了信仰、缺少价值凝摄。然而价值基础才是认同的根本保障。现代性颠覆了传统价值，切断了终极意义的来源，也斩除了认同最为坚韧的纽带。

2. 现代性的美好愿景和宏大叙事决定了它对认同和秩序的强烈偏好。然而市场体制又势必形成多元利益主体的竞争和对抗。于是现代性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制造认同和维护秩序，另一方面则充斥着不可避免的断裂和冲突。人们处于现代性的自反性和矛盾性之中，莫衷一是，手足无措。

3. 当科技与工业迅速发展，不同社群可以共享全球“标准时间”，人们可以穿越的空间边界也越来越广阔。这种时空分离必然地造成了社会关系的“脱域”和“嵌入”，于是人们越来越频繁、激烈地卷入陌生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语境。虽然这带来了开阔的眼界和行动的自由，却也瓦解了环境的恒常性、剥夺了生活中本有的确定性，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都变得越来越难。

4. 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让人们的认知不断地被新的知识刷新，每一刻都处于巨变之中，没有什么确定无疑的。一样事物还没有被深刻学习，就似乎已经变得落后了，“一切都会不宣而至，不辞而别”²。这就造成人们越来越难以确定稳定的自我，深度的认同越来越罕见。

我们并不否认现代性创造了进步和繁荣的神话，但它也面临着诸如认同危机等风险的催迫。

三、缓解现代性认同危机的范式——对话（八到九章）

现代性转型在每一个国家都引发了巨变，一些学者认为，现代性应当进一步

² 鲍曼著，郇建立、李静韬译：《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拓展和释放自身的潜能以克服危机。他们把缓解现代性隐忧的方案都落实到了微观层面，即个体及其生活世界。他们认为正是在对个体的生存和道德问题的观照中，自我认同、纯粹关系、积极信任和对话民主才能扎实地培育和生长。

而对话正是联结宏观与微观的梯子。它让个体成为有德行、抱持积极信任的参与者；它让自我在与他者的积极交往中形成真正的思想，从而形成自我的独特性和完整性；它促进个体在公共领域表达意见、彰显自我、增益公共之善；它可以弥合自我的视域剩余，拓展自我的外在性；它能够重振人际交往、培育纯粹关系、建立积极信任.....对话将权利落实到个体，造就积极的公民和行动者。从有效的个体表达、人际交往出发，经过“积极上升”，对话的观念、原则和方式可以扩大到各类社会组织、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体，当多元主体奉行平等对话主义，认同的可能性就会扩大，这正是克服认同危机的根本保障。总之，对话能够弥合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共同体与个体、同一性与多样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使现代性的宏观进步与微观解放彼此增益，使人们自主地进行利益互惠和意义分享，以达到再造认同、共同体的目的。

而我认为对话的更优秀之处在于它本身所蕴含的开放平等意识、互为主体原则和双向交流方式，它既拥护了现代性所倡导的认同和秩序的价值，又捍卫了差异性、多样性和独立性原则，这些实际上就是认同的重要来源。

现代性的互联网技术在 21 世纪开启了对话时代。一个理想的对话伦理应是所有对话者以对话的方式思考、言说和行动，在事实层面促进利益互惠，在价值层面促进意义分享，遵守真实、真诚、正当、可理解等言说原则以保证大家能够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真诚地参加讨论、负责任地发言、担当同等的责任。然而在众声喧哗的围观下、在瞬时即刻的意见竞争中、在浅思考、浅交往的行动情境中，构筑人类共同体的道德基础，促进真诚、平等、义务共担的全球对话依然是尚未完成但十分重要的步骤。因此，而作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当事者，更作为传媒从业者，我们要做的不只是遵循善、发现善，更是在内容上传承、创造、分享善，重彰价值理性。